

《现今世界大势论》与 20 世纪初 梁启超对国际形势的认知*

葛小辉

【摘要】 出版于 1902 年的《现今世界大势论》构建了 20 世纪初梁启超理解国际关系的系统框架，其论述充分涵盖了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开启了 20 世纪中国人思考国际秩序的序章。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强调及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剖析，深化了晚清以来政学精英的对外认知。不过，他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帝国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若要求得生存，就必须顺应这种趋势，模仿 19 世纪中期以降的列强进行自我改造，这种立场是彼时梁启超认识国际关系的局限性所在。尽管存在这种局限性，但梁启超在一种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下展开的有关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仍然为时人提供了重新思考中国和世界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 梁启超 世界大势 民族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 无形瓜分

【作者简介】 葛小辉，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B25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3) 12 - 0061 - 19

历史研究往往与时代变革相伴而行，面对新的时代形势与问题，人们需要重新思考、叙述历史，从中归纳出有助于人们认识新形势、新问题的经验、视角与理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新审视与今天仍然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重要命题，对我们理解当前的国际格局与世界形势有着重要作用。在此意义上，今日颇有必要重读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梁启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中国传统对外思想演变初步研究”（2023YQNQD019）的阶段成果。

超关于彼时世界大势的论述。^① 清末梁启超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让他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言人”，^② 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青年时代的阅读和思考历程。其中1902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现今世界大势论》可以说集中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以及他分析相关问题时的理论基础，因此极有必要加以深入探究。

一、认识国际关系的系统框架

《现今世界大势论》在1902年5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之前，先以《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为题在1902年2月至4月连载于《新民丛报》，故二者内容完全相同。^③ 不同的是，前者作为单行本出版时，不仅划分出不同小节并添加了节标题，使其结构更加清晰，还把1901年7月至8月发表在《清议报》上的《灭国新法论》收作附录。

对《灭国新法论》的基本内容、思考逻辑和理论渊源等，已有学者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脉络出发做了深入分析。^④ 在《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指出，今日世界乃“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的世界，在此“新世界”中，灭人之国亦有“新法”。所谓“新法”，正如梁启超在埃及、印度、波兰等“亡国”案例中揭示的，强国往往不必像过去那样动用武力攻城略地，而是通过金融放债、代为练兵、派遣顾

① 相关的先行研究涉及中文“帝国主义”概念发生史、清末梁启超对思想界的影响、东学对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影响等，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崔志海、葛夫平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陈力卫：《“帝国主义”考源》，郑文惠主编：《东亚观念史集刊》第3期，台湾政大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382页；葛静波：《“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译介、认识与话语》，《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72~179页；等等。这些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化相关思考提供了良好基础。

②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崔志海、葛夫平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③ 《现今世界大势论》未被收入《饮冰室合集》，大概也是因为它与《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内容相同。《饮冰室合集》既已收入后者，无须再收入前者。广智书局将《现今世界大势论》作为单行本出版，并把《灭国新法论》收作附录，应该是为了便于推广，从而进一步提升其影响力。

④ 参见王锐：《“灭国新法”：清末梁启超对世界大势的剖析》，《人文杂志》2023年第1期，第86~99页。

问、修筑铁路、煽动党争、助平内乱、助力革命等方式就可以达到侵略、控制别国的目的。在对中国近事与各“亡国”史做比较分析时，梁启超以埃及亡于向列强举债、波兰亡于“争党派联外国”之殷鉴，强调中国正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地。^① 凡此种种，让清末中国读书人在“开眼看世界”方面得以更进一步。

在《灭国新法论》揭示列强“灭国新法”的基础上，《现今世界大势论》搭建了一个系统认识彼时国际关系的框架，堪称 20 世纪初立足中国视角的一本“国际关系学概论”。从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看，梁启超在这本小册子中有关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和民族帝国主义由来，列强推行帝国主义之情形，列强经营中国之殖民政略、铁路政略、传教政略和工商政略的论述已经充分涵盖国际体系的三个基本要素——国际规范、国际行为体和国际格局。^② 同时，他着眼中国，重点阐述了列强侵逼下中国危如累卵的形势与摆脱危局的路径，具有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

关于国际规范，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前两节论述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时认为，民族主义是制造近世国家的原动力。在其驱使下，“各民族咸汲汲然务养其特性，发挥而光大之。自风俗习惯法律文学美术，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而与他族相竞争”。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各民族“范围既日推日广，界线亦日接日近，渐有地小不足以回旋之概”。基于此，梁启超认为“夫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于外，此事理之必然者也”，于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遂成十九世纪末一新之天地”，^③ 而支撑民族帝国主义的哲学逻辑是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④ 照此逻辑，人权不是天赋的，权利亦非生而平等，“苟能自强自优，则虽翦灭劣者，而不能谓为无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则然也”。依据民族帝国主义，“优等人斥逐劣等人而夺其利，犹人之斥逐禽兽，实天演强权之最适当而无惭德者”是“文明之常规”，此乃“近世帝国主义

① 参见梁启超：《灭国新法论》，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2 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23 ~ 732 页。

② 参见阎学通、阎梁：《国际关系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 ~ 28 页。

③ 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51 页。

④ 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以美国为例，指出随着美国在 19 世纪晚期成为帝国主义强权，帝国主义者祭出达尔文主义，既为征服弱小民族辩护，也为满足帝国的欲望服务。尽管军国主义或宣扬盎格鲁—撒克逊人优越性的种族主义无须等待社会达尔文主义问世来为自己辩护，但达尔文主义在 19 世纪末的确成了种族理论家和斗争理论家手中的新工具。参见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思想潜流》，汪堂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12 ~ 214 页。

成立之原因”。^①

关于国际行为体，梁启超认为彼时全球80余国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代表帝国主义的第一等国——英、德、俄、美；二是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尚未能达其目的者；三是被帝国主义侵略而势将不能自存者。^②梁启超重点论述了英、德、俄、美的帝国主义实践。^③于英国，他指出，因为英国对属地的依赖远大于属地对它的依赖，所以“英人之政策，务使其母国与属地永不相离，不惟保守其版图而已，又使其海陆通航之路，交通便利，以是为第一要义”。而英国以工商立国，在当时德国、美国工商业迅速发展带来的竞争压力下，英国从世界工业中心逐渐变为世界资本中心，通过在美洲、非洲、亚洲大量投资而获取利益。因此，未来英国的对外政策重在追求“扩充其工业资本两者之势力范围”。于德国，梁启超认为在列强中它“最能发挥现世帝国主义之特性，代表近来世界历史之趋向”。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初实现统一后，经过俾斯麦长期的苦心经营，国力大增。对外商业竞争迫使政府不得不为贸易保驾护航，德国于是开始上下一心实行帝国主义。德国原以陆军称雄于欧陆，如今为了决雌雄于欧洲以外，遂以扩张海军为急务。^④

于俄国，梁启超称其帝国主义“由来最久”，彼得大帝的主义方针便是“俄国二百年来之主义方针”，即在欧洲追求获得出海口，在远东追求取得不冻港，以促进其内地的繁荣发达。但因为俄国的帝国主义“必非如外国之欲求市场于他地也，彼虽求得市场，而亦无制品以充物之利用之”，所以俄人经略世界“不用飞越远攫之法，而用就近蚕食之法”。于美国，梁启超预测它将来必成为“平准界中独一无二之大帝国”，而麦金莱总统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乃出于“美国民族之大势，有使之不得不然者”。随着工商业的进步，美国不得不尽全力开拓新市场，又兼纽约、芝加哥等大都市成为世界金

① 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3页。

② 参见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页。

③ 参见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4~1261页。

④ 梁启超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积极进取”颇为赞赏，但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指出，威廉二世好大喜功又优柔寡断，其“个性与德国内政体制相激励的结果”是“根本无法产生明智负责的政策”，其强势的威胁性的外交竟然使曾经是死对头的英法、英俄有一天达成和解、站在同一战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欧洲均势体系下反德同盟和武器竞赛的形成，给德国乃至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参见[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151页。

融中心，“平准大权，竟由欧而移于美”。因此，在梁启超看来，美国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并非为了扩充其幅员，而是要获得“商业政略所不可缺之地”，“故其政策能得国民多数之赞成，为有识者所许可”。

对国际格局，梁启超一方面勾勒由各国力量分布形成的全局性结构，另一方面则关注牵动主要行为体、影响力量分化组合的焦点问题。于前者，梁启超在把全球各国分为三类时，便已揭示了其背后的力量格局；于后者，梁启超认为，晚近三十年来，欧洲列强对欧洲以外的广大世界垂涎三尺，在不具备成为世界竞争中心点之价值的南美洲和非洲，列强尚全力相争，遑论作为“天府之奥区”的亚洲。列强在亚洲的竞争，第一期焦点在印度，第二期则集于中国。^① 在《现今世界大势论》的第八节至第十一节，梁启超详述列强经营中国的各种“狐行”般的政略，因其手段诡秘，故给中国造成的危害更大。在结论部分，他提出了中国摆脱困境的途径，强调应推行民族主义，步武列强，成为民族帝国主义国家，先求自存，继而扩张。在详述列强经营中国的政略时，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狐行”与“虎行”的区分，以及对资本主义“制我之死命”性质的强调，足以引起时人的危机意识，这部分实为《现今世界大势论》的核心问题意识所在，后文会另做探讨。

可以说，梁启超的上述分析揭示了 19 世纪以降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内在逻辑。霍布斯鲍姆认为，1875—1914 年之所以被称为“帝国的年代”，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当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占取殖民地、建立殖民帝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帝国主义’一词，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对殖民地征伐的讨论中，首次成为政治和新闻词汇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在这个时期取得其经济涵义，而且一直保持至今。”^② 同时，19 世纪中期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为主导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形态，逐渐向由国家介入乃至主导进行扩张的形态转变，政治和经济因素日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政府在国内和国外都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与梁启超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也是“由政治与经济要素的一种独特混合所构成的”。^③

不过，梁启超似乎更强调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而霍布斯鲍姆则认

① 参见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62 页。

②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4 页。

③ [德] 沃尔夫冈·J.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97 页。

为，“占取殖民地的经济动机，渐渐与达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动无法分开，因为任何一种保护主义都必须在政治力量的协助下运作”，而“一旦列强的地位开始和能否在某个棕榈海滩（或者更可能是一片干燥的灌木林）升起它的国旗扯上关系，占领殖民地本身就变成了地位的象征，不论这些殖民地的价值如何”。在这种时代风潮下，“甚至连向来不把帝国主义等同于拥有正式殖民地的美国，到了1900年左右也感到不得不顺应潮流”。^①在19世纪90年代，列强瓜分世界固然有着经济上的重要性，但霍布斯鲍姆并不否认，与帝国主义扩张有关的政治、情感、意识形态、爱国情操乃至种族诉求也是彼时历史面貌的一部分。韦伯更是进一步提出，“帝国主义的扩张欲之所以不断高涨，就在于政治权力结构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最初只是以军事和政治形式出现，然后才波及经济领域”，也是在此意义上，“韦伯明确否定了经济因素是首要动因”，认为“抱有以国家为取向的权力声望感”是帝国主义扩张欲的观念内核。^②

从今天的后见之明看，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强调，颇暗合于当时英国进步自由主义者霍布森在其名著《帝国主义》中的论述，以及十多年后列宁的帝国主义分析进路。与霍布斯鲍姆认为美国在1900年左右是因“顺应潮流”才占取殖民地不同，霍布森则认为，当时美国制造业资本已呈现饱和状态，对美国的工业和金融巨头来说，“它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要么花钱花到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花，要么去夺取国外市场。摆在它们面前有两条出路，告别过去的政治孤立，面向未来采取帝国主义政策”。他强调，“罗斯福总统及其‘天定命运论’、负有‘文明使命’的政党的冒险热情不应当使我们迷惑”，因为“需要帝国主义的是洛克菲勒、皮尔庞特·摩根、汉纳、施瓦布先生及其伙伴们，是他们把帝国主义加在这个西方的伟大共和国的头上。他们需要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想利用本国的国家手段为资本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否则，这些资本就成为多余的了”。^③列宁则认为，“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因此，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

①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5页。

② 参见[德] 沃尔夫冈·J. 蒙森：《马克思·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97~98页。

③ 参见[英]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6~77页。

就愈激烈”。^①

在此意义上，应该说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的分析为时人揭示了一种在世界大势下考虑中国命运的国际视野，开启了 20 世纪中国人思考国际秩序的序章。从整体来看，此文本搭建起了一个认识彼时国际关系的完整框架，并把落脚点放在中国面临的危局和脱困之道上。同一时期梁启超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国处境的文章基本均可统摄在此文本的核心问题意识下。比如，1899 年 5 月至 8 月发表的《瓜分危言》详论甲午战后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面临的有形瓜分之危险，以及在铁路权、财权、练兵权、用人权等方面遭受的由来已久的无形瓜分之危害；^② 1899 年 10 月发表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痛陈列强常以铁路、矿务、关税、租界、传教等“暗力”进行侵略，致使中国前途堪忧；^③ 1907 年 10 月发表的《世界大势及中国前途》阐述国际竞争的原则等，^④ 这些都与《现今世界大势论》桴鼓相应。在此意义上，《现今世界大势论》堪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梁启超讨论世界形势和中国处境的集大成之作，是他那个时期相关论著中一种承前启后的存在。

二、“狐行”的帝国主义

前文提到，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最终是为了思考中国的处境和出路，此则其核心所在。

自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海外扩张一波接着一波。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描绘的那样，在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浪潮下，“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0 页。

② 参见梁启超：《瓜分危言》，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2 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72 ~ 886 页。

③ 参见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2 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10 ~ 813 页。

④ 参见梁启超：《世界大势及中国前途》，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2 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14 ~ 817 页。

世界”，其结果即“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实践遇到了根本性危机。

在此背景下，时人不断思考振衰起敝之道，而关键就在于厘清近代西方乃至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进行殖民扩张的内在动力与逻辑。从19世纪后期开始，面对全球经济的困难情势，东西方列强为寻找市场、瓜分利源，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它们首先要求“低开发世界市场实行‘门户开放’”。等而下之，则“希望能分割到一点属于自己的领土”，由此可使本国企业居于垄断地位，至少占有相当大的优势。这一新的形态“是脱离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过程的一部分，在同时也意味着大公司和垄断企业的兴起，以及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较大干预”。^②在此背景下，梁启超等政学精英在思考中国问题时，就必须将政治改革与经济、社会变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同时还须认清资本主义垄断与扩张的形态。

梁启超在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阅读了大量日人译著的西学书籍，知识体系和思想为之一新。戊戌年间他对现代经济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教士译介的小册子的影响，倾向于认可主张自由贸易论的古典学派，并从《史记·货殖列传》等古籍中寻找可以佐证其学说的史事。^③到日本后，通过阅读有关帝国主义的著作，观察当时列强的政治与经济政策，梁启超开始摒弃过去那种简单的古典经济学教条，深入分析在帝国主义、国家主义盛行之际中国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以及如何在全球视角下把握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状况。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启超强调：“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彼列国之所以相对者姑勿论，至其所施于中国者，则以殖民政略为本营，以铁路政略为游击队，以传教政略为侦探队，而一以工商政略为中坚也。”^④

可以看到，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工商政略在列强蚕食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早在咸同时期，郭嵩焘等人就隐约观察到，英法等进入中国，并非为了抢占土地，而是为了与中国“通商”“修约”，因此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页。

② 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2页。

③ 参见[日]森时彦：《梁启超的经济思想》，[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222页。

④ 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4页。

可“循理”处之。^①但随着与列强的频繁交涉，一批士人对后者的意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郑观应就认识到，所谓西方进入中国不以侵占土地为目的，并非列强也注重传统儒学意义上的“理”，而是别有所图——“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抵御之法则在于“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②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梁启超更明确地认识到工商政略在列强对外活动中的意义，这自然跟前文提到的 19 世纪晚期出现的新的国家和国际经济形态直接相关。梁启超认为，列强在弱小国家推行的工商政略是一种无形的瓜分，危害更甚于有形的瓜分，因为它难以引起人们的警惕：“野蛮国之灭人国也如虎，皮肉筋骨，吞噬无余，人咸畏之；文明国之灭人国也如狐，媚之蛊之，吸其精血，以瘵以死，人犹昵之。今各国之政策，皆狐行也，非虎行也。”^③他在《灭国新法论》中也有相似的论述：“昔之灭人国也骤，今之灭人国也渐；昔之灭人国也显，今之灭人国也微。昔之灭人国也，使人知之而备之；今之灭人国也，使人亲之而引之。”^④

在同一问题意识下，除了强调帝国主义的“狐行”特征，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还揭示了他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⑤他认为：“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界者则为强国，嗇于平准界者则为弱国，绝于平准界者则为不国。”对全球“平准界变迁之大势”，他指出：“资本家与劳力者之间，划然分为两阶级，富者日以富，而贫者日以贫。”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发展：“自机器制造之业兴，有限公司之制立，而畴昔之习一手艺，设一厘肆，得以致中人之产者，殆绝迹于西方矣。自托辣斯特之风行，而小制造厂小公司亦无以自立矣。”不仅如此，这种资本兼并还具有国际性：“自今以往，五大洲物产人力之菁英，将为最小数之大资本家所吸集。至此外之多数者，亦非必迫之使为饿殍也。要之苟非摇尾蒲伏于大资本家之膝下，而决不能以自存。此实未来之暗黑世界，前途之恐怖时代，稍有识者所能见也。”

结合前揭梁启超对国际规范、国际行为体和国际格局的分析，他的上述

① 参见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湾广文书局 1983 年版，第 378～379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 3《商战》，邹振环整理：《危言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3 页。

③ 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69 页。

④ 梁启超：《灭国新法论》，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2 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23 页。

⑤ 参见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69 页。

看法不免让人想起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帝国扩张的动机并非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是出于特定阶级的利益，这些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将扩张政策强加给国家”，而“帝国主义的性质阻碍了世界新增财富在各国的合理消化过程”。帝国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贸易才去开发市场，并用外国廉价产品的经济优势取代本国的工业生产，并维持自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阶级统治地位”。^①也就是说，列强之所以热衷于对外扩张，在“政治理由”背后有着至关重要的“经济理由”——资本家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支配力量，后者通过殖民扩张占领海外市场、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只不过梁启超并未像霍布森那样明确意识到资本势力在列强对外政策中的主导作用，而是认为列强的帝国主义行动是出自全民的共同意志。

梁启超对帝国主义的了解越深入，就越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担忧。在他看来，晚清中国经济社会的萧条固然有官吏剥削和巨额赔款的缘故，但更切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平准界之横风怒潮，波及于我国也”，^②亦即伴随列强工商政略而来的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他预计“二十世纪之人类，苟不能为资本家，即不得不为劳力者，盖平准界之大势所必然也”。^③当帝国主义国家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步步深入地控制中国，让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分子时，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处于下风的中国而言，全国省县将很快落入欧美资本家手中。大多数中国人将成为外国资本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的主权也将为外国资本操控。这种无形的危险正是彼时中国人需要倍加警惕的。

如前所述，梁启超敏锐地观察到，作为现代政治一大特征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因此，对中国而言，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垄断资本主义背后往往有国家力量作为支撑：“夫平准竞争之起，由民族之膨胀也；而民族之所以能膨胀，罔不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来。故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于平准界能称雄者。”有鉴于此，梁启超认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

① [英]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帝国主义》，卢刚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12、281页。

② 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9页。

③ 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0页。

之？”^①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中国脱困之道的思考，实际上是立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的。他相信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帝国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若想生存，就须适应这种趋势，模仿 19 世纪中期以降的列强，建设一个积极进取的民族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同一逻辑，在与《现今世界大势论》同年发表的《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中，梁启超把汉代出使西域的张骞和班超描述为与近代西方殖民者相似的人物。这种描述显然背离了历史事实。之所以如此描述，是因为他秉持这样的观点：“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民，又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中国以文明鼻祖闻于天下，而数千年来怀抱此思想者，仅有一二人，是中国之辱也。虽然，犹有一二人焉，斯亦中国之光也。”^②与之类似的是，在 1905 年 2 月发表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梁启超把明代以后移民至东南亚的华人视为中国的“殖民者”，把“海以南百数十国”视为“天然我族之殖民地”，希冀中国有朝一日能够“扩张其帝国主义”，主张借鉴“列强殖民，莫不以政府之力直接间接奖励之”的做法。^③

梁启超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此“迷恋”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应该与他在日本接触的国家主义思潮有关。国家主义是当时日本的主流思潮，梁启超在日本吸收的核心思想正是国家主义。^④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后，以俄国为假想敌整军经武，以求“一雪前耻”。梁启超受到弥漫日本全国的尚武风气的影响，期盼中国也能学习这种精神，以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他在 1899 年的《答客难》中为自己搁置世界主义而提倡国家主义进行辩解：“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理想之时矣。”^⑤换言之，世界大势如此，中国亦不能不顺应之以求生存，甚至在生

① 梁启超：《现今世界大势论》，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71 页。

② 梁启超：《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4 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21 页。

③ 参见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4 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58 ~ 2059 页。

④ 关于梁启超在日期间主要受国家主义思潮影响这一点，学界已有成熟研究。参见 [日]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日文本序”，第 5 页；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8 ~ 181 页。

⑤ 梁启超：《自由书·答客难》，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 4 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74 页。

存获得保障后还要进一步寻求扩张。

梁启超的民族帝国主义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其中的青年群体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晚清的政治改革风潮中，与梁启超一样曾为立宪派人士^①的杨度于1907年1—5月发表著名的《金铁主义说》，其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与《现今世界大势论》多相类似。杨度指出，在甲午战争以及庚子事变后，列强对中国采取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不过是为了均分财产，列强确定的“势力范围”不过是财产范围，所谓“势力”亦不过是其经济势力。列强仅以其经济势力便能对外扩张，“此不独其国中工商发达之结果，其势不能不膨胀于外”，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无法抵御列强侵略，还缘于对方有强大的海陆军作为经济势力的后援，“其经济势力之所至，实即其军队势力之所至”。^②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如果中国人不想被外国资本家彻底支配，就要奉行“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③

在1903年发表的《新湖南》中，作者杨笃生虽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为梁启超主办的时务学堂的教习，此时却秉持革命立场阐释自己为何要提倡“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他在阐述中国及湖南面临的危局时，显然借鉴了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对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以及列强侵略中国采取的各种政略的分析，认为“今日地球诸国，所谓陵厉无前者，帝国主义也，而此帝国主义，实以民族主义为之根柢”，想要阻遏帝国主义潮流，只有发扬民族主义一途。^④

梁启超前论对青年群体的影响，还可从1903年初湖北留学生在东京创办的具有显著革命倾向的《湖北学生界》中略窥一二。该刊第2期的《学生之竞争》援引梁启超提出的“灭国新法”概念，分析列强对中国利权的侵夺：“开矿山、筑铁路实为灭国之新法”，以至于仅依靠大资本家的力量就能亡人之国，“今自帝国主义之跃出，商战之烈，远倍于弹烟炮雨”。^⑤第

① 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8~107页。

② 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1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③ 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第1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④ 参见杨笃生：《新湖南》，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32页。

⑤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55页。

3 期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更进一步，大量运用乃至直接引用梁启超分析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古今灭国异同、有形和无形瓜分时采用的概念和观点，来剖析中国面临的危局。对中国的出路，作者秉承与梁启超相同的立场，即在弱肉强食的大势下，中国若不实行民族主义，将“被淘汰于二十世纪民族帝国主义之潮流”。^①

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改良主义者，还是秉持革命立场者，均受到梁启超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国出路的思考的影响，俨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而放眼全球，梁启超主张建设民族帝国主义国家的思想，应该说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国际主流政治思潮的“中国式”回响，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氛围。在颇受梁启超赞赏的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彼时韦伯这样的人物也正怀着强烈的民族帝国主义信念，鼓吹其德意志帝国理想，渴望把德国建设成“像英国或者俄国那样的世界强国”。^② 甚至当时的左翼组织——作为工人运动世界组织的第二国际，在 1904 年于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的《殖民政策和社会民主党》报告也认为，宗主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应该简单地放弃旧殖民地。“因为这些殖民地还没有自治的习惯，一旦长期的托管有所放松，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和贫困”，所以“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创立一种条件，使某种野蛮状况能够为较高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所代替”，这在一定的情况下是人们应当履行的“神圣的道的责任”。^③ 不仅如此，“工人阶级胜利后和工人阶级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后出现的新的需要，将使殖民地甚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必要的”。^④ 从这些表述中，可以清晰地读出代表那个时代主流思潮的文明等级论以及作为其底层逻辑的进化论的影响。

三、民族帝国主义的局限性

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梁启超充分看到了列强的民族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中国若不思考振衰起敝之道，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由

①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465 页。

② [德] 沃尔夫冈·J.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97 页。

③ [苏] 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111 页。

④ [苏] 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116 页。

于受到浮田和民、加藤弘之等日本国家主义者的深刻影响,^①梁启超认为中国也必须学习列强,成为民族帝国主义国家。他的这一立场,从清末到民初并未发生很大变化。梁启超关于中国出路的这种思考,既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相距甚远,从20世纪的历史演变趋势看,也未能看到一种更平等的新国际秩序的可能性。这可以说是其局限性所在。

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而言,它虽讲究“华夷之辨”,但并非像近代西方的文明等级论一样,把所谓文明国家对“半文明国家”或“野蛮国家”的压迫视为理所当然。略举一例,据《春秋公羊传》记载,鲁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冬,“齐人伐山戎”。传文曰:“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对此,何休解释道:“时桓公力但可驱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杀之甚痛,故去战贬见其事,恶不仁也。”^②也就是说,《春秋》虽贬斥“夷狄”,但并非不将“夷狄”视为生类,而是同样对之抱有仁人之心。即使是孔子称赞有加的齐桓公,当他对山戎迫杀过甚时,也要受到春秋笔法的谴责。

此外,在《礼记·孔子闲居》《庄子·大宗师》《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六韬·文韬》《六韬·武韬》等古代各家典籍中经常出现的诸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以及“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等思想,凸显的也都是天地万物平等生存的权利,即天下必须为公,而非弱肉强食。沟口雄三在分析中国传统公私观时认为,虽然日文中的“公”是从中国传入的,但与日本的“公”仅保留了领域性含义相比,中国的“公”除了领域性即公家和私人的区分,还具有指向公平无私的道义性。迄于近代,福泽谕吉亦曾呼唤“天下之公道”,但他说的“公道”不过是指各藩摒弃“藩之私情”而共同致力于国家富强的一种国家主义。相反,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则强调用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世界上的弱小民族打抱不平,这种民族平等的主张的基础“不可否认是那种肯定公(公平、平等)的传统的‘天下为公’思想”。^③

① 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227页。值得注意的是,郑匡民在该书第170页明确指出:“日本的国家主义(Nationalism),是在日本的近代化中由西方列强的外压而产生的,这种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思想,应当说是正义的。但不幸的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由于这种国家主义的畸形发展,最终使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

②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2页。

③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赵士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1页。

就建设一种更为平等的国际新秩序而言，在梁启超的观点中看不到对 19 世纪以来殖民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的反思，因而也就无从想象一条超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实现国家间平等的道路。实际上，除了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19 世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也以日本为中介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十年间，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出现较为广泛的传播。比如，1899 年出版的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和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分别是日本最早介绍欧美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状况的专著和最早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二者均在 1903 年被译介到中国。近代的文明等级论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视为“文明”的主要内涵，东西方列强经常借之为侵略活动提供说辞。福井准造和村井知至对列强所谓的“文明”进行了反思。福井准造指出：“所谓社会既奏改良之功者，不过自政治上之改革以来，得理论上之平等。”因为劳动者虽名义上享有契约自由和平等权利，但从社会经济地位看，仍无异于资本家的奴隶；虽能参与政治并享受法律保护，但也不过是虚荣——夜以继日的辛勤劳作甚至不能养活自己，何况供养病妻饥儿？由此福井准造不禁质疑：世界上富者日增，贫民亦日增，贫富悬殊，“是岂十九世纪文明之特兆欤？”^①

村井知至也从多个方面批判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文明”的虚伪性。于政治制度，他认为彼时欧洲各国从表面上看似采用民主政体，实际上却出于专制。因为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多数之无力者，隶从少数也。约而言之，则财权即政权也。富商巨贾，可以倾动朝廷”。于经济制度，他认为“彼所谓财富增加者，特偏集于一方耳……盖资本家独占优利，劳力者愈增贫困”。社会不平等达到极致，“是亦文明乎”？于社会制度，他指斥其“实与人以竞争之权，而助长其利己之精神者也。彼其熙熙穰穰，相率而趋于利场……斯真文明隆治之时，化为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战场矣”。他甚至直言：“如是而谓之文明，则文明实蠢贼耳！”村井知至还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战争提出了批判：“盖输才养兵，虽属今世界不获已之事，然以理论之，糜万家之膏血，养一国之爪牙，以杀伐为功，以战争为务，极不仁之事也。且劳费无已时，吾人每望有止戈之一日。”^②

近代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广长舌》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于 1902 年出版后，也立即被译成中文。与当时大多向往帝国主

^① 参见 [日] 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熊月之主编：《近代人文社会科学译著·2》，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92~93 页。

^② 参见 [日] 村井知至：《社会主义》，侯士绉译，熊月之主编：《近代人文社会科学译著·2》，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0~11、32~38 页。

义的日本学者不同，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幸德秋水对帝国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① 较之福井准造和村井知至，幸德秋水进一步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和外部冲突结合起来思考。他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使大多数人民陷于贫困凄惨之境地，“是殆在贫富悬隔之过甚也；是盖在贫富悬隔之过甚，而生活之竞争，遂因之猛烈”。“工业之萎靡”“军备之烦黩”“贫富之悬隔”“生活之竞争”“多数之困厄、饥饿、罪恶”等，“皆帝国主义之流弊，传播于世界者”。解决上述各种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消除贫富差距，欲达此目的，只有社会主义一途：“盖社会主义者，二十世纪之急切要件，世界文明进步之要害关头也。”^②

随着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彼时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的关注也与日俱增。1903年邓实发表《论社会主义》，认为19世纪的文明已打破“政权之不平等”，而20世纪的文明“必将打破经济之不平等”，社会主义“必将飞扬鼓舞于二十世纪”。他明确地把对内消灭剥削和对外建立平等秩序关联在一起，认为随着对国家内部剥削的克服，强国奴役弱国的国际体系也会发生变化，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其手段，则欲变少数之国家为多数之国家，变海陆军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压其偏僻爱国之心也，以科学的平和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以布拉沙呼德之世界主义而扫荡刘除其侵略帝国主义也。”^③

如果说邓实只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学理介绍，那么随着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于1906—1907年东渡日本，并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有了更多交往，这些中国革命者开始更为深入、系统地思考如何突破资本主义列强支配的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建立一种新的亚洲和世界秩序。1907年4月，章太炎等人与印度等国的爱国志士携手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旨在使亚洲的被侵略国家和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使已失却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这是流亡日本的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爱国志士共同发起的第一个反帝联合组织。^④ 《亚洲和亲会约章》呼吁亚洲诸国互相扶持、互相协助，希冀印度和中国作为大邦

① 参见葛静波：《“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译介、认识与话语》，《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74页。

② 参见〔日〕幸德秋水：《广长舌（摘录）》，中国国民丛书社译，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③ 参见邓实：《论社会主义》，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3~66页。

④ 参见陈力卫：《“帝国主义”考源》，郑文惠主编：《东亚观念史集刊》第3期，台湾政大出版社2012年版，第377页。

若幸得独立，则可以发挥保护邻国的作用。^① 它显示出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的广阔视野，他们已经开始自觉地把中国的命运与亚洲各弱小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思考，并试图以文化作为联系亚洲各国的纽带，展现出一种超越政治对立和意识形态分歧、把亚洲各国视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想。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强调各国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较早提出的一种新的亚洲国际秩序。

1907 年 11 月，刘师培发表的《亚洲现势论》也体现出相似的思想。尽管他提倡的亚洲各国同时独立、不设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设想是不切实际的，但他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对当时亚洲形势所做的分析，仍富有进步意义。刘师培也采用了与幸德秋水一样的内外结合视角，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列强对内压制本国人民与对外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彼时欧美各国政府与富民的势力日增，人民却日趋贫苦，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盛行，而帝国主义发达的原因则在于“政府资本家欲攫取异国之金钱，利其愚弱，制以威力，由是托殖民之名以扩政府资本家之实有”。其结果不仅有害于“弱种之民”，而且有害于“本国之人民”，后者不仅因政府扩张军备而须担负过度的税赋，还因资本势力日增而不得不承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苦果。^② 这种内外关系是刘师培思考亚洲各国实现独立自主途径的前提。他倡导亚洲各国在世界主义下团结起来，并与东西方列强国内的民党即社会主义政党联合，使“民党革命为属地独立之机，属地独立又为民党革命之机”，若此则人类之自由可图。^③

同样在 1907 年，革命党人张继和刘师培等受幸德秋水领导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并邀请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前来演讲。^④ 讲习会广告称：“近岁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⑤ 换言之，如果仅着眼于发展民族主义乃至民族

① 参见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第 10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79 ~ 281 页。

② 参见刘师培：《亚洲现势论》，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13 页。

③ 参见刘师培：《亚洲现势论》，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17 页。

④ 参见郑匡民：《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日本思想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141 ~ 142 页。

⑤ 张继、刘师培等：《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25 页。

帝国主义，那么即便实现民族独立，在国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上恐怕也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难以真正解决民生问题。

通过邓实、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论说，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所持观点的局限性。此时梁启超对列强内部状况与对外政策之间关系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前途的思考尚有待进一步深入。

四、结语

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为时人勾勒出一种认识彼时国际关系的系统框架，使人们能够以一种国际视野反观中国的处境并思考摆脱危局的途径。他对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的分析，更是为晚清政学精英深入理解时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不过，梁启超在清末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逻辑对中国脱困之道的思考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在他对一战德国必胜的错误预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一战爆发后不久的1914年11月，梁启超撰写《欧洲大战史论》。对战争结局，他坚信德国不会失败。在他看来，德国实为近代国家之模范：“德人政治组织之美，其国民品格能力训练发育之得宜，其学术进步之速，其制作改良之勤，其军队之整肃而忠勇，其交通机关之敏捷，其全国人之共为国家一器械而各不失其本能，凡此诸点举世界各国无一能逮德者。”因此，只要国家主义存在一日，德国这样的模范国家就断然不会失败。不仅如此，“以德与英、法诸国战，无异新学艺与旧学艺战，新思想与旧思想战，新人物与旧人物战，新国家与旧国家战。使德而败，则历史上进化原则自今其可以摧弃矣”。^①可见，梁启超是从国家主义和进化论的角度预言德国必胜的，这体现出他对国家主义和进化论的高度服膺，其预测与历史走向大相径庭的事实又反过来说明，他对二者的推崇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他对客观世界的观察。

由此看来，梁启超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对中国出路的思考，看似描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却被历史证明存在较大缺陷。或许梁启超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战结束后，为考察战后的西方世界，他与蒋百里等人赴欧旅行，旁听巴黎和会，记录下诸多新的思考。此时梁启超注意到，一战结束后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风起云涌，是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爆发的结果：“你们说奖励国产、增进国富是目前第一要义，我还要问一句，国富增进了究竟于我有何好处？你们打着国家的旗号谋私人利益，要我

^① 梁启超：《欧洲大战史论》，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4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6页。

跟着你们瞎跑，我是不来的。这种思想在战胜国的劳动社会中，已是到处弥满了。”^①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面对列强的资本力量时，与西方劳工有着相似的命运：“我国国内，虽然不配说有资本家，却是外国资本家早已高踞上游，制了我们的死命。别国资劳两阶级是把国内的人民横切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压制者，一部分是被压制者。我国现在和将来的形势却不是这样，全国人都属于被压制的阶级。那压制的阶级是谁？却是外国资本家。我们全国人所处的境遇，正是外国劳工阶级所处的境遇。质而言之，我们四万万人，都是劳工阶级里头的可怜虫罢了。照这样看来，这劳工问题，在欧美各国，不过国内一部分人的苦乐问题，在我们中国，却是全个民族的存亡问题了。”^②较之 1900 年前后，此时他的分析视野显然有了新的拓展。

总体而言，梁启超在清末揭示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帝国主义的“狐行”特征等，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为 20 世纪前期中国政学精英思考国际秩序的一个基本前提。近代著名史家钱穆在抗战后期撰写《战后新世界》一文，认为 400 年来的旧文化换个角度看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之文化”，“这一次的世界大战，更足证明四百年来欧洲中心旧传统的殖民地经营，路途已穷”。中国在太平洋战事中的地位，体现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对旧世界四百年传统殖民侵略文化之一种革命战争”。因此，它与大西洋战事相比，“更应该具有决定将来新世界之重要意义”，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收获“则将为殖民经营之阻抑与停止，以及殖民地统治制度之解放。此后世界新文化将为世界平等，而非欧洲中心，于是而有一种新国际”。^③钱穆坚信帝国主义必定走向终结，战后的“新世界”也就新在这里。钱穆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属于进步阵营的知识分子。帝国主义问题成为 20 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变革过程中必须正视的面相，也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了。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13 页。

②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214 页。

③ 参见钱穆：《战后新世界》，《学思》第 1 卷第 10 期，1942 年 6 月，第 244 ~ 250 页。